

DENGXIA XUESHU
WENCONG

灯下学术文丛



灯下，是学者灵魂安静栖居的所在，也是思想自由飞翔的地方。以此为一系列原创性学术丛书命名，意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倡扬一种学术沉潜的努力与用心。同时也有对学者角色定位的明晰与期待。记得唐致先生《述怀》诗中有云：「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胸得清河一墨水，古人与我话衷曲。」这种意境，于今虽然难得，但是我们不应放弃对它的向往。这样，我们时常迷茫的心灵中才会有一盏灯高高挂起……

—— 编辑人语

路文彬 / 著

历史想像的 现实诉求

——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LISHI XIANGXIANG DE
XIANSHI SUQIU

1207.42
L879



20023885

路文彬 / 著

历史想像的 现实诉求

——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路文彬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3

(灯下学术文丛)

ISBN 7-80647-467-6

I. 历... II. 路...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2328 号

书 名: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

作 者:路文彬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发 行: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4.25

字 数:31 万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ISBN 7-80647-467-6/I·315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46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走进历史深处(序)

陈晓明

文学与历史的相互缠绕,一直构成现代以来文学的本质关系。这种关系过分自然,以至于没有人怀疑它们的结合有什么人为或不恰当的地方。因而,也就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探讨。我本人一直对这个问题怀有较大的兴趣,当代中国如何处理“历史化”的问题,也是我数年来关注的核心理论问题。因此,读到路文彬的博士论文《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就有一种强烈的理论共鸣,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路文彬的这部博士论文出手不凡,如此全面深入地梳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尚不多见,而作者的理论素养和才气以及做论文的功效,都值得称道。

这部博士论文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对文学的历史观念进行历史梳理方面。博士论文做一个课题总是要探本求源,但如何探本、如何求源,却因功夫是否到家而大相径庭。路文彬师从曹

文轩教授,也可见出乃师严谨细致的风格。路文彬显然在材料上下足了工夫,近代以来关于文学与历史有牵连的材料,他大都用上了。近代、现代特别是当代,线索理得相当清晰。近现代之交,小说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有着密切关系,小说之历史观念也因此具有了现代性意义。作者对小说的历史观念的现代性起源的追溯是很有见地的,例如,梁启超对小说的社会功能的看法,以及由此引发的“小说界革命”的激进举措,这些都开启了现代小说观念的先河。我注意到路文彬比较纯粹的美学理想,他倾向于从美学的角度,而不是社会的角度来评价小说的价值和小说观念。在对“小说界革命”进行评价时,他认为:“小说界革命”终结了小说对历史单方面的承诺关系,新生的小说并未找到小说的真正的自我。这个“真正的自我”就在于小说如何作为作者内心情感和经验表达的媒介,而不是廉价地充当着国家与社会重大问题的传声筒。

我以为,“历史本来(只能)如何”与“历史应该如何”要作出区分。在“历史应该如何”方面,我同意路文彬的看法。但在对“历史本来(只能)如何”方面,或者说,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变革的直接关联评论方面,我倾向于去理解它本身的复杂性。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建构中,如何评价小说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文学艺术只能生长于它的社会语境,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现象,现代小说也正是在建构关于民族—国家的想像这一点上,它才有了自己的位置和意义。

何谓现代小说?何谓中国现代小说?这两个问题有重叠,但又有分歧。西方现代小说的兴起当然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有关,它与大量表达私人情感的历史诉求有关,与现代印刷术

兴起、私人收入增加、图书普及相关。欧美现代小说的兴盛与现
代性的关系是循序渐进式地相互关联的,它是社会的物质生产
和精神生产平行发展的结果。但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则有着强
烈的政治色彩,小说直接卷入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乃至卷入社
会革命。现代小说的出现虽然与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和城
市化相关,但更主要的得益于强烈的思想文化变革运动推动。
现代小说的兴起几乎是强制性地与国家-民族的历史性建构紧
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小说的兴盛与政治改良
运动、与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直接相关。小说被确认了社会教
化功能,这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历史性认识。对当下的
社会现象的批判,与对未来进步文明的追寻相联系,构成了一套
思想范畴和价值评价体系。五四时期发生的文学革命,毫无疑
义地把文学与新文化运动、与强烈的社会变革诉求联系在一起。

从这一观点来说,现代小说的历史观念问题,显然与现代启
蒙思想强制性地推行的社会理念相关,中国现代小说因为具有
承载表达这些理念的功能,从而成为建构民族-国家想像的重
要资源。确实,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很难简单地判断,小说
表达的历史观念与社会变革直接相关是合乎艺术规律或反艺术
规律。路文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有自己明确的艺术理念,不过,
艺术理念本身是历史性地建构的,也只能历史性地评价。中国
现代小说与中国早期现代性的建构相关,如果秉持比较纯粹
的艺术理念来观照其历史轨迹的话,我担心会抹去它应有的历
史意义。

在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观念进行梳理时,路文彬看到了
“重写历史”这一本质性问题,由此进入到对文学与历史关系最

核心的问题,当然也由此揭示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最为特殊的艺术规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为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想像资源,为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奠定了感性认知和情感认同的基础。社会主义文学为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的讲述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小说,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小说,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为导引,建构全体民众统一的意识形态想像关系。时过境迁,人们会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过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嗤之以鼻,但回到历史中去看问题,就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就能说明问题的实质。1949年以后,中国走着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与西方分道扬镳,直至分庭抗礼。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深受前苏联的影响,这使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支配达到绝对化的地步。在东西方冷战时期,面对西方的封锁,以及后来与苏联交恶,这都使中国独特的现代性道路,需要调动更广泛的资源,特别是思想文化资源作为动力。现实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手段,它为中国持续的社会革命建立了合法性的历史前提,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形象的依据。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就是政治的派生物。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现代性之外,或是对现代性的悖反;它应该被看成现代性的一种形式,它是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很难从已有的全球化经验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找到根据,因而,文学艺术提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也就不难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围绕着

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展开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和运动。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表明,现实是第一义的,现实本身蕴涵着客观真理(本质规律),作家艺术家只有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才能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真实。很显然,这里的“客观真实”是被事先约定的,只有符合事先约定的本质规律,才被定为是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本质规律”。使客观事实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具有真理的第一性,这是强调权威绝对性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在这里,所有的权威话语都巧妙地转化为“客观规律”,因此,只要强调客观的绝对性,也就是强调权威的绝对性。因为谁能反对“客观事实”或“客观真理”呢?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审美原则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它为维护客观历史的绝对性起到有效的作用。路文彬在这一主题上的论述相当出色,他看到社会主义文化重新书写自身历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深入分析了“重写”的表意方式和美学倾向。

路文彬并不是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叙事归结为单纯的意识形态诉求,他看到了这里面的裂痕和复杂性的结构。在关于国家叙事和个人记忆的关系中,路文彬分析了宗璞的《红豆》、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也许选择女作家来分析这个问题是颇为巧妙的,女性作家对个人情感的敏感,即使在革命叙事中也难以全部被压抑。当然,路文彬敏锐地看到这种分离并不是作家的有意识的行为,其实质不过是文学创作想像自由与国家现实功利维护之间的固有矛盾。这部博士论文的显著特点不在大的理论观念的设定上,而是理论细部做得相当出色,对于学术著作来说,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没有总体性的理论设定,可能会使理论著作的力度打点折扣,但没

有理论细部的独到的分析阐释,那就使理论思想没有存在的基础。有时候,理论细部会使一部著作充满魅力,生长出许多大的理论观念无法概括的思想。特别是在大理论随着乌托邦冲动趋弱,越来越陷入原创性衰退的境地时,更是如此。

从清理现代文学的历史观念到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重写历史”的现象,直到解读“新历史主义”小说,可以看出路文彬的思路力图勾勒出一条关于“历史的”历史线索。在对苏童、格非的一系列小说的分析中,路文彬揭示出先锋小说对历史元叙事观念的改写。曾经由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那些历史观念,以及由革命叙事建立的那些经典模式,在先锋小说这里遭到颠覆。不管是苏童的《妻妾成群》,还是格非的《大年》,人物的动机和故事的发展已经不是由过去所认定的那些本质关系起决定作用,而是“欲念”。传统宗法制社会面对的危机来自生存延续的内在性,这在苏童多部讲述过去故事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格非的《大年》和《迷舟》这类作品,在描写人物的行为动机时,起作用的不再是过去的阶级斗争或革命觉悟,而是个人的情欲。现代革命史赖以存在的根基,它的合法性和历史合理性,似乎都面临解释的困境。当然,“改写”经典革命叙事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确实引起人们对历史神话建构的反思,但它也有把历史重新神秘化的可能性。路文彬对其革命性的一面展开较为充分的分析,而就另一面则还有待深入。

路文彬认为 90 年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受到欧美“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他所持的理由有三:其一,中国小说“重写历史”之潮的兴涌,是在西方“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诞生之后;其二,这些“重写历史”的作品在历史解读观念以及艺术操作方式

上,同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主张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其三,在现今中西方文化对话日益频繁的时代,“新历史主义”渗透入中国,完全有可能对当代作家产生重大影响。我以为,这几条理由都还不足以说明“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当代先锋派作家(以及其他作家)的直接影响。讲到影响当然要直接接触到该理论才谈得上,没有迹象表明在90年代初,“新历史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坛传播并形成理论氛围。最早的关于“新历史主义”的翻译著作,是由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该书出版于199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在那时,路文彬提到的大部分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已经面世。另一方面,不管是先锋派作家还是其他类型的作家,据我的观察,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新历史主义”的直接经验。他们的写作主要是出自艺术创新方面另辟蹊径,考虑在马原、莫言之后,如何开辟这代人的道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学已经开始从现实意识形态热点退却下来。所谓“社会问题”不再是表面的可以达成共识的问题(例如“声讨文革”、“要不要改革”),更深层次更复杂的问题显然不是文学所能面对和言说的。这本身就使整个文学共同体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心退却出来。更年轻一代的作家根据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去寻求艺术创新的道路。所谓“历史小说”实则是给他们进行语言和叙事方法的实验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

实际上,要论证先锋派讲述的历史故事与“新历史主义”的联系,并不一定要假定它们之间有直接的影响关系。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先锋小说的历史叙事,无疑是很有效的理论阐释。用一种理论阐释一种现象,并不一定需要论证二者之间

具有整体的相似性或类比性——这反倒是一种形似。而用一种理论视点透视一种现象,反倒有可能揭示出二者之间的神似。这也使理论的运用更加自如,并有更多发挥的余地。

总而言之,路文彬对中国现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的历史观念有着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他的清理透彻而细致,既有阶段性的整体概括,又有非常精到的细部分析。惟一有一点缺憾的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对他所论述的问题作一概括。当然,总体性的概念确实要承担更大的理论风险,因为这样更有可能以偏概全,更具有理论的暴力倾向。但做理论与做风险投资一样,所冒的理论风险愈大,收益率愈高——也就是说,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和力度就越大。到底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包含的历史观念表征什么样的意义?它所发生的变异又表征何种意义?找到一个恰当的概念进行总体性的把握,在这一框架里来描述和分析,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理论收获。当然,我这可能是苛求。

路文彬给我们描述了一幅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建构“历史化”从而又如何解构“历史化”的过程,他特别分析了 90 年代出现的各种“非历史化”的文学现象,他提醒我们重新关注“无法消弭的历史性在场”。确实,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似乎被更多的非历史化场景所淹没,在没有历史记忆的书写中,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但也面临无法排遣的虚无。历史/非历史化、反历史/重新历史化,其实始终是文明变更中的内在张力和动力。历史无处不在,历史无法终结,终结不过是某一种历史,而“历史”则永远在场,永远以各种方式潜在地起作用。因为所有的“终结”都不过意味着历史将重新获得起源。正如杰姆逊

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政治无意识》的开篇写道的那样：“永远历史化。”

看得出，路文彬的理论素养相当好，他熟知西方现代历史哲学和文学理论，特别是对后结构主义理论有相当精湛的理解，这是他这部著作有丰富理论含量的基础。我始终认为，要做好当代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如果不熟知西方现代理论，那肯定无所作为。我不认为用了西方理论的研究就是拾洋人的唾沫，就是舶来品；我同样不认同“中国人就要说中国人的话”这种狭隘的态度。这些说法似是而非，看上去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操，洋溢着民族尊严感，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作了片面而狭隘的理解。

事实上，自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文化深受西方的影响，从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一整套的观念方法都早已在中国学术文化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现在反对用西方学术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观点，几乎忘记了这样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前提，他们显然把从西方启蒙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看成中国本位文化，否则，如何回到中国文化本位呢？西方近世的思想方法可以用，何以西方现代以来的新理论就不能用呢？用了何以就变成舶来品呢？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恰恰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大国文化，是一种融合和再创造的能力始终强大的文化。中国文化并不在世界之外，也不是西方的他者，他就在世界之中，他就是世界的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它并不惧怕外来文化的挑战，也不惧怕外来文化大规模渗透。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始终敢于最大限度地吸取外来文化的养料，所以它才能不断重建自身，不断获取自我更新的资源和动力。确实，中国文化自从近代以来就面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挑战，

这种挑战和应战的交融还将持续下去,因为,一种文化的调整、融合和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可能要经历漫长的一个世纪、两个世纪,甚至更长。一些文化坚持下来了,一些文化消亡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现在,从事当代理论研究的工作艰难困苦,研究者歪歪斜斜的脚步书写着文明自我更新的篇章,谁说他们就不是民族的脊梁呢?

在这篇被称之为“序”之类的文字中,看上去我是在和路文彬进行讨论,我甚至更多地表达了我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似乎偏离了序言这种文体的本质。我想,路文彬这部著作是如此生动丰富而发人深省,它使我情不自禁产生要与他广泛讨论的愿望。这部著作触及到的理论问题是如此之多,它的阐释是如此独到而自成一格,任何读到这本书的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对话冲动,都会激发不同的想法。我以为,这就是一部著作最有价值的地方。

陈晓明

2001年8月20日

第三节 “英雄时代”历史书写遗绪及其流散…………… (184)

第四节	追寻历史之根·····	(202)
第三章	拆毁历史既定模式·····	(219)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的反叛·····	(220)
第二节	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237)
第三节	重聚历史碎片·····	(253)
第四节	历史的堕落与宿命·····	(271)
第四章	后现代性历史诉求·····	(290)
第一节	削平历史深度·····	(291)
第二节	游戏历史的恶作剧·····	(307)
第三节	历史/现实的融合生长·····	(323)
第四节	后现代中的现代性话语·····	(339)
第五章	作为修辞的历史感·····	(359)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小说之后·····	(360)
第二节	历史认同与怀旧叙事·····	(376)
第三节	无法消弭的历史性在场·····	(393)
第四节	历史空白者的历史书写·····	(410)
结 语	克隆时代的历史遭遇·····	(425)
主要参考书目	·····	(431)
后 记	·····	(436)

导论 中国小说及历史关系探源

无论是在西方抑或东方,小说与历史之间的暧昧关系都可谓由来已久,传统小说的纪实性追求同历史本身固有的虚构性品质,于一定程度上使两者成为同体共生的文本形态。特别是表现在小说那一方面,由于它对真实性超乎寻常的注重,因而总喜好将自己置换于历史的名义之下。诚如 J. 希利斯·米勒所指出的那样:

一部小说传统上并不被看做是小说,而是被当做语言的另一种形式。它差不多已经成为了某种“再现的”形式,深深植根于历史与“真实的”人类经验的直接报告之中。小说似乎耻于把自己描述为“自己是什么”,而总爱把自己描述为“自己不是什么”,描述为是语言的某种非虚构的形式。小说偏偏要假托自己是某种语言,而且标榜自己同心理的或是历史的现实有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以此来体现自身的合法性。^①

^① J. 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第 37 页,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在此,小说正是以反小说的亲历史面目来争取读者认同的。倘若要继续往纵深处去穷究小说同历史间的这种共生关系,那又不能不涉及到神话传说的所谓文学/历史的双重文本功能。

在文字尚未出现的远古时代,历史只能运以传说形式,凭借先辈们的记忆存留下来;而在之后口口相传的漫长岁月里,历史又由于人们的理解和渲染,被不断以虚构的成分加工、丰富着。如此一来,传说就在经过日益神话化的过程当中逐渐具有了双重性,变为史实与虚构的混合体。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同戏剧和小说一样是从神话中生长起来的。……在其中的事实和虚构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①。历史的这种神话化,使其作为文本的神话传说,从此开始承担起文学和历史的双重文本功能。不过,需要提及的是,历史在被神话/文学化的同时,神话/文学也一样被历史化了。正像有人这样断言:

不管愿意不愿意,历史学家都变成了一种神话作者。

任何想把耶稣基督从被视为救世主的神话中分离出一个历史的耶稣基督的企图可能和对罗宾汉进行历史性的探究一样的荒唐无用。^②

而事实上,文学与历史互化所呈示出的胶着关系,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早已露出了端倪。缪斯本是司掌艺术的九位女神,但其中之一的克丽俄则是一位历史女神。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历史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55页,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 K.K.卢斯文:《神话》第18页,耿幼壮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